

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

論文卷

中卷

丛书总主编 迟文杰

本分卷主编 陆志红

编纂机构 新疆天山天池管理委员会

学术支持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

論文卷

中 卷

丛书总主编 迟文杰

本分卷主编 陆志红

编纂机构 新疆天山天池管理委员会

学术支持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
PDG

《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大型系列丛书通过收集、整理、刊布古代关于西王母的文献记载、考古资料、文物图片等，目的在于系统介绍国内外学术界和相关文学、艺术等研究领域迄今关于西王母文化的记述与研究成果，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重大影响，且现今仍有社会、学术价值的重要资料与著作。

《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论文卷》是关于西王母这一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以及相关神话、传说、宗教、史料等诸多方面的研究论文集成，其收录百余位专家学者的专论近150篇，从西王母研究的开山之作一直到最近的西王母文化研究成果，以及国外研究论文的译文，都尽力搜选。因此，本书堪称西王母文化研究方面最全面而翔实的资料汇编大全。

新平社
PDG

责任编辑 刘哲双 吴晓斌
郝志坚 李 玲
装帧设计 张今亮
制 作 启文博雅工作室
<http://www.bbtbook.com>

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博库书城 www.bookuu.com
当当网 www.dangdang.com
卓越网 www.amazon.cn

丛书总主编

迟文杰

本分卷主编

陆志红

编纂机构

新疆天山天池管理委员会

学术支持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学术顾问委员会

安志敏	王仲舒	栗智	李学军	刘志勇	林少雄
石彦玲	孟凡人	杨泓	薛宗正	王邦维	安家瑶
王巍	白云翔	王仁湘	贾应逸	伊弟力斯	
张玉忠	李军	李国瑞	邱陵	陈明	巫新华

丛书策划

巫新华



西王母与七夕文化传承

[日]小南一郎

古代的神话，处在随时代而变迁的社会结构之中：有的其主题与作为其中心的神没有流传到后世，形式上消亡了；有的改变了表面上的意向，衍生为传说或故事。在这一章里，拟取西王母为后者的一例，描述一下它作为神的性格（机能）与七月七日夜男神和女神相会传承的密切关联，并就此探讨在这一基础上作为神话的意义结构及其在时代潮流中改变面貌的情形。

《山海经》中所见的形貌恐怖的神西王母，出现在《汉武帝内传》里已变为美丽的女神，某些文学史援引这一事实，以说明从中可看出自古代到南北朝时期说话发展的大方向。^① 这种从进化论观点所作出的说明，如果仅止于记述事物的表面现象，虽非全然错误，但却不能认为其所具有的意义仅止于此。所谓“古代的神话伴随时代而逐渐人化了”的说法，乍一看虽易于了解，但却缺乏对历史与社会的确切把握。因为在这里显然是并没有在“人化”这一事实中充分虑及其含有的深刻历史意义。宗教信仰性质上的改变，以及与之紧密结合的说话的变化，虽然在有的方面确实是渐进的，但在本质上，却应当认为它们是敏锐反映历史潮流巨大转折的、飞跃发展的产物。

说话的变化本质上是飞跃的，这是与历史发展（其基础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① 例如，谭正璧编：《中国小说发达史》第二章第四节“西王母故事的演化与东王公”，1935。

常常并非渐进、巨大变化往往急剧发生这一事实相对应的。说话的演变正是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对应着的,但这种对应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却不是直线的。说话在表面上表现的内容并非原原本本地直接反映其所从属的社会。社会结构和生活的种种相貌必然经过一定的折射而在故事中反映出来。

成为处在这一复杂关系中的说话与社会的联接点的,就是作为故事背景的礼仪与祭仪。宗教仪式,其场所、组成人员(参加者)以及伴随其仪式的幻想样式等方面,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牢固结合着的。任何幻想^①,如不以特别的礼仪为中介扎根于社会之中,都不可能产生与发展。而同时,正是那传承所具有的共同幻想,随着社会的发展游离于原来的礼仪,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而独自发展、结晶成为传说。在本章里,仅举出西王母与七夕传承为例,以处在这一关系中的礼仪和伴随它的共同幻想为观察中心,试略解明说话与社会的对应关系。

一 牵牛织女故事

在夏夜的长空中,被南北流向的天汉(天河)所阻隔的牵牛星与织女星瞬息间相会了。仰望这牵牛与织女,自古人们流传下来各种各样的传说。王荈桥回忆童年时代,讲了这样的故事:

记得是一天的晚上,繁星灿烂,清风轻飘,我和妈妈、弟弟聚在一块纳凉,妈妈就教我们看天上星斗,妈妈说:“在银河沿岸的那颗状如鸭姆的,叫作鸭姆星;下面那颗形似犁尾的,叫作犁尾星;银河东边的那颗做成三角形的,就是织女星;西边那颗成一直条的,就是牛郎星。”妈妈说毕,弟弟就接着问道:“妈妈,何以天上的星要有大的和小的呢?”妈妈答道:“天上的星有大小,就像地下人的有富贫一样;大的就是富的,就像下室伯父;小的就是贫的,就像□和二婶母。”这时妈妈又教我们唱一段歌儿:“牛郎西,织女东,牛郎三足鼎,织女一条楣。”^②

接着,王荈桥记录了母亲所讲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讲到梁、祝二人相

^① 这里使用“幻想”一语,意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人们的意向、愿望、追求,是社会意识的一种表现形态。——译者注

^② 王荈桥:《牛郎织女的故事》,载《民俗》1939年第80期。

爱而不能结合,死后升天成了牵牛与织女。这个梁山伯为牵牛、祝英台为织女的传说不一定流传很广,把这两个系统的传说结合起来大概也不是本来的形态,但这个例子显示出牵牛织女传承具有可塑的适应性,是能够与各种爱情传说结合起来的。

当今仍这样在民众中流传的牵牛织女传说,具有古老的历史渊源,随时代经过了种种变化。在通过变化而适应时代的同时,构成自古以来的核心的传承表面上消失了,但仍在给传说继续注入顽强的生命力。

《史记·天官书》这样记载牵牛、织女四周星座:

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①

这里认为牵牛星在河鼓之南。但在《尔雅·释天》里认为何鼓(河鼓)就是牵牛星。河鼓,如《史记》中所见作左右各有一星相从形;按西洋称呼,是 Altair 与天鹰座的 β γ 星呈一字横列的三颗星^②(因为三星并列为一直线,在中国又被称为扁担星^③)。织女,在《晋书·天文志》里称“织女三星”,可推定是由以 Vega 为顶点、与天琴座 ϵ 与 δ 星共同构成的呈明显三角形的星座^④。在后汉时代的山东省肥城县孝堂山郭巨祠画像石上,这三角形的星座像戴在操纵织机的织女头上(图 1)。在那织女与月亮(左面画有蟾蜍和兔子的圆圈)之间近月位置上,画成并列一直线的三颗星大概就是牵牛(河鼓)。同样的图画也见于河南省南阳的画像石上(图 2)。在那里,织女跪在四颗星下,而在牵牛之上可见河鼓三星。如果举出不像上面那样组成为星座而只描绘牵牛与织女的例子,则在四川省郫县后汉墓石棺盖上,与龙虎戏璧图相对,画有牵牛与织女。牵牛头戴三山冠,拉着牛急趋织女一边;而织女,据报告说,手执绕丝板作招呼牵牛状(图 3)。^⑤

①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

② Altair 即天鹰座 α 星,古称“河鼓二”。——译者注

③ 《尔雅·释天》“河鼓谓之牵牛”句郭璞注:“今荆楚人呼牵牛星为檐鼓。檐者,荷也。”又郝懿行《尔雅义疏》加上了更详细的说明:“今南方农语犹呼此星为扁担。盖因何鼓三星中丰而两头锐下,有檐何之象,故因名焉。”

④ Vega 即天琴座 α 星,古称“织女一”。——译者注

⑤ 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载《考古》1965 年第 2 期;后在《考古学与科技史》(1979,北京)中又曾指出洛阳前汉墓墓脊部分也绘有河鼓与织女三星,并引孝堂山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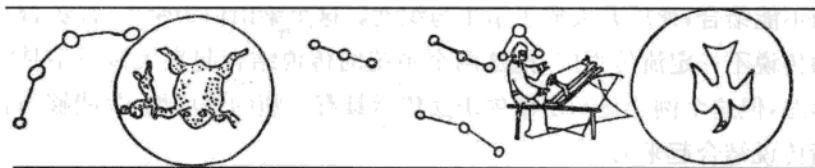


图1 织女图



图2 牵牛织女星宿图



图3 牵牛织女图



图5 牵牛织女图



图4 织女图

在朝鲜壁画墓里也有绘有牵牛、织女的。在高句丽大安里1号坟里,在表示南方的朱雀之上绘着可能是表示天汉的波纹,在其上的建筑物中可以看到操纵织机的织女(图4)。同是属于高句丽的有永乐十八年(408)的德兴里壁画墓里,绘有隔着细细的天河作离开织女状的牵牛和送别他的织女,织女身后有一条狗(图5)。在这幅图里,牵牛左上方四角方围里墨书“牵牛之象”,织女一方只可看出“□□之象”,这让人确认是牵牛织女图。织女与狗组合在

一起的例子别无可见,或许与日本的牵牛饲犬的传说有关系。^①

从下面《诗经·小雅·大东》篇的诗句推测,这牵牛与织女两个星座结合为一组,自古似曾被赋予特殊的意义: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

这篇《大东》,被解释为苦于周王朝苛敛诛求的东方人所作,他们歌唱天上虽有织女事实上却不能纺织,虽有牵牛也不能拉车。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唱到织女一日之间“七襄”。“七襄”一语,朱熹《诗集传》谓未详其义,引用《毛传》和《郑笺》这样说:

《传》曰:反也;《笺》云:驾也。驾谓更其肆也。盖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谓肆也。经星一昼一夜,左旋一周而有余,则终日之间自卯至酉,当更七次也。^②

朱熹以为其义大体不可解,又据郑玄以为众星一日之间自卯(东方)至酉(西方)经七个星次,故称“七襄”。但这个说明是很勉强的。从“虽有七襄,不成报章”的表现方式而言,可推定“襄”本是与机织有关的用语。“襄”字从“衣”,也有助于这一推测。虽然解明这首诗中“襄”字的正确含义尚待来日,但语作“七襄”,则可以认为它含有“七”这个数字的符号的意义,与后来确定七月七日这个日期是相关的。或以为《大东》诗与七夕传承没有关系,笔者是不能赞同的。特别是这首诗的内容里大量包含出于知识阶层观点的表现,不一定是直接反映了民间的传承。大概当时民间已经存在构成后世七夕节祭礼仪核心的传承,^③可能是以这种传承为基础,通过知识分子有意识的加工改作,变形而为这首《大东》。

承续着《诗经》的这首诗,在更富有传说性质的歌谣里,有汉代《古诗十九首》里的一篇:

① 柳田国男:《犬饲七夕谭》,《柳田国男集》第十三卷,筑摩书房。把牵牛星叫“饲犬星”,已见于《和名类聚钞》。

② 《诗集传》卷十二《大东》。

③ 原文用“行事”,或称“年中行事”,泛指一定季节、节日的礼仪、风俗等。本为中国古代用语,现已不常用。本书中视文意译为“节祭礼仪”或径用原语。——译者注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里牵牛与织女星被拟人化了，歌唱他们二人被天汉阻隔，虽然相见却不能交语。这《古诗十九首》已不是纯粹的民间歌谣。其形成时期现在虽仍有争论，但可以确认这篇《迢迢牵牛星》至迟在后汉后期已被创作出来。

在后汉末，人们已经认为七月七日牵牛和织女相会的日子，这从崔寔的农事历《四民月令》的如下记载可以知道：

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如地河之波，辉辉有光曜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乞愿，三年乃得。^①

这段文字的后半，或以为可能混入了晋周处《风土记》的文字；^②但从前半部分已可知道，在后汉时代，围绕牵牛与织女的七夕传承的主要部分已经形成了。同是后汉时代的应劭《风俗通义》（《岁华纪丽》卷三所引）里说：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鹄为桥。^③

这里是以为织女以鹄代桥渡天河去访问牵牛。而在六朝后期题为梁吴均所作《续齐谐记》（《艺文类聚》卷四）里，说到世人传说这一夜织女嫁牵牛，则以为二人的婚姻是在这一夜里举行的。

但为什么牵牛与织女只在七月七日相会？在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七

① 《艺文类聚》卷四所引。

② 守屋美都雄：《中国古岁时记の研究——资料复元を中心として》，帝国书院，1963，286页；又参阅缪启愉、万国鼎：《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77—78页。

③ 范宁：《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见《文学遗产增刊》1955，第一辑）引用《佩文韵府》卷一〇〇同样的记事出于《风俗记》，认为此佚文是否出于应劭尚有疑问。大概这里是把《风俗通义》与西晋周处《风土记》混淆了。参阅守屋：《中国古岁时记の研究》，314页。又《淮南子》佚文（《草堂诗笺》卷二所引）中亦有：“乌鹄填河成桥，以渡织女。”这是否出于《淮南子》亦可怀疑。而圈称的《陈留风俗传》（《李峤杂咏注》所引）中有：“七月七日，织女会牵牛，乌鹄填河为桥。”由此可推定汉末时已有此传说。又七夕那天渡天河的是牵牛还是织女也是问题。按上例或《南史》卷三记载，本来是作织女渡河的。《南史》有一情节，说刘宋后废帝七夕夜，命近侍杨玉夫伺织女渡河时报己，后醉寝被杨玉夫所杀。

夕》条里又可以见到如下说明：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哀其独处，许配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衽。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①

这一段传说是与我们所知的七夕故事极为接近的。但如注中所述，这段《荆楚岁时记》佚文是否是原来宗懔著作中的却仍有某些疑问。

关于牵牛与织女成婚后生活不顺利的理由，《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用如下一段文字：

《日纬书》曰：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主关梁；织女星，主瓜果。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天帝赐钱二万备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②

营室是相当于飞马座的星宿。这部道教书中所见到的内容，亦见于《荆楚岁时记》隋杜公瞻注，可知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的传说。但借钱不还而夫妇离异这世俗性的情节，恐怕是与原来的神话传承稍有距离的。

牵牛织女的传说，现在仍在中国各地广为流传。赵仲邑把那些传说加以整理，区分为三种类型。^③ 赵氏所作的未必是搜罗全面、严密的区分，这里只介绍如下：

- (1) 与《荆楚岁时记》所见同一系统的；
- (2) 与梁山伯、祝英台传说结合的；
- (3) 与女鸟型故事合流的。

从现在中国流传的属于第一类型的民间故事中仅举一例。钟敬文教授记录的广东省陆安(海丰)传说讲到下面的故事：

牛郎和织女，他们是天上一对又美丽、又乖巧的少年人儿。当他们

① 这段文字由玄珠：《中国神话研究 ABC》(1926，上海)、袁珂：《中国古代神话》(1957年增订版，上海)、范宁：《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见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编：《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1958，北京)等所引用，但不见今本《荆楚岁时记》，典据不明。罗永麟：《试论牛郎织女》(《见民间文学集刊》第二本，1957)和后出《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1986，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自《琅玕代醉篇》引用同一文字作《述异记》。

② 《太平御览》卷三十一《时序》。

③ 赵仲邑：《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见《随笔》第二集，1979。

没有结婚之前,两人一样十分勤勉地做着自己的工作——牛郎牧牛,织女经布。天帝看他们活得这么可爱,所以恩赐他们结成夫妇。哪知缔婚之后,两人只管深深地爱恋着,再也不把各人自己的职务放在心中——牧牛、经布的事,都抛荒了。

这种情形,后来给天帝知道了,他心里很是愤怒,即刻下了一道圣旨,命乌鸦前去传言,此后两人须各居河之一边,每七天,才准过河相会一次。

乌鸦是顶拙于口才的东西。它这时得了御旨,便急急飞向两人同居的地方去了。它把好好的“每七天相会一次”的话,误说作“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即此以后,他们便永远每年只有一次的见面了。^①

在这个民间故事里,认为牵牛与织女只能在七夕相会,是他们做事懒惰所致。该情节与七夕传承的核心有着密切关系,这是下面通过“乞巧”等行事的分析所要证明的。可以认为这一类型的民间故事,比起其他形式的关于七夕的民间故事,保留着更古老的内容。

而这个传说中被当作“坏人”的乌鸦,大概是与本来在两人间做中介的喜鹊起同样的作用的。例如宋罗愿《尔雅翼》卷十三说:

涉秋七日,首无故皆秃。相传为此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鵲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②

这里是在七夕脱落羽毛的鵲。又宋晏几道《鹧鸪天》词说:

当日佳期鵲误传,至今犹作断肠仙。

桥成汉渚星波外,人在鸾歌凤舞前。

这里误传佳期的是鵲。这种鸟,应认为具有使牵牛与织女结合与分离这两种相反意义的机能。

第二种类型梁山伯与祝英台结合牵牛、织女的例子,见于本章开头只引用其起始部分的王芾桥《牛郎织女的故事》。据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相互爱慕

① 静闻(钟敬文):《陆安传说》,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第10期。

② 洪氏:晦木斋丛书本。

而不能结合,死后升天为牵牛星和织女星。^①但正如前所述,这两个传说的结合,恐怕不是本来的形态。因为这两者的结合不具备充分的必然性,而且还可发现两者并没有充分融合在一起。变一个角度说,男女间的特别是以不幸告终的恋爱传说,是全都具有与牵牛和织女传说结合的可能性的。

第三类与女乌故事相合流的传说,在目前中国的七夕民间传说牛占大多数。举一个例子,现仅据李肃立编《神话传说故事选》中所收汉族牛郎织女传说,分条试写出其情节梗概如下:

(一)有个年轻人,叫牛郎,爹妈都死了,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哥哥嫂子苛待他,只有老牛是他的朋友。

(二)有一天哥哥提出分家,只分给牛郎破车、老牛。牛郎离家出走,和老牛一起过日子。

(三)一天晚上,老牛突然开口说话了。说明天黄昏,有些仙女在山中的湖里洗澡,去偷拿她们脱下的衣服中的那件粉红色的纱衣,跑到树林里等着,丢衣服的仙女就会成为你的妻子。

(四)牛郎按老牛的话做,仙女果然成了他的妻子。原来那个仙女是天上王母娘娘的外孙女,织得一手好彩锦,名字叫织女。

(五)牛郎、织女结婚转眼两三年过去了,他们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六)一天,老牛眼眶里满是眼泪,说自己要死了,死后剥下它的皮,碰见什么紧急事就披上,说完就死了。

(七)知道织女从天上溜掉的王母娘娘,派了天兵天将到人间察访,知道织女在牛郎那里。趁牛郎在地里干活,王母娘娘从天而降,把织女抓走了。

(八)牛郎得知此事,披上牛衣,用两个筐一个筐里放一个孩子,挑起来上天追织女。

(九)正当牛郎眼看要追上带着织女回去的王母娘娘时,王母娘娘拔下玉簪儿往背后一画,忽然现出一道天河,把牛郎隔开。

(十)这样牛郎和织女就在天河两岸,不能住在一块了。他们成了牵牛

① 据赵景深:《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续稿)》(见《民间文艺丛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天上的牛郎降生到地上为梁山伯、织女降生到地上为祝英台的情节,已见于《梁山伯宝卷》(文益书局)。或许这种附会的情节产生自成为《宝卷》产生基地的说教场所。

星和织女星。日久天长,王母娘娘允许二人七月七日会一次面。

(十一)每年七月七日,喜鹊飞集天河搭成一座鹊桥,让牛郎、织女在桥上相会,每逢那一天,空中很少看见喜鹊。那天夜里,在葡萄架下还可以听到牛郎、织女说话声。^①

目前在中国流传的七夕传说,细节有种种不同,但基本上属于这第三种类型。这一类型的传说,在某些地方剧种里,名为《天河配》或《牛郎织女》上演。^②例如在安徽省地方戏黄梅戏《牛郎织女》里,以为牵牛、织女、老牛(金牛星)本来都在天上,此外的情节与以上各条所写大体一样。

这与女乌故事合流的七夕传说,情节很复杂,应是汲取几个传说、民间故事的要素才形成为现有形态的。例如开头嫂子虐待弟弟的部分,大概取自某一时代别一系统的民间故事,后来投合了听众的兴趣,被突出并加以传说(譬如就日本的情况而言,中世以后人们喜好听后娘虐待前房儿子的故事,与这一情形是相对应的)。女乌故事是否为本来的七夕传说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尚有疑问。这其中,在第三类型传说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贯穿全篇的老牛很活跃。牵牛在重要情况下,只是按老牛所说的去做,没有多少主动性。这一类型的七夕传说,也可勉强叫作以牛为主人公的传说。

牵牛织女传说,在赵仲邑所举出的以外,还可确立一个类型。这第四个类型的故事是,到牛郎那里去的织女,后来又嫌恶牛郎而回到天上了。例如流传在江苏省北部的传说有如下内容:

牛郎和织女都是天上的星宿。织女是玉皇大帝的孙女,叫天孙星,成天在机旁织云锦。牛郎把那云锦上的花草当真花真草割了起来,两人相识,成了恋人。王母娘娘不愿让二人成婚,金牛星与南极仙翁设小计谋,趁王母醉睡,二人逃到了人间。

两个人在人间生下一男一女,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织女停了纺纱织布。后来王母和玉皇派来了使者,织女与使者一起回天庭去了。

① 李肃立编:《神话传说故事选》,北京出版社,1982。

② 罗永麟:《试论牛郎织女》(见前)推断到唐代以后,牛郎织女传说与毛衣女(女乌传说)和两兄弟(嫂子虐待弟弟)的主题合流。如加以比较,则可能是毛衣女主题比两兄弟主题更早地与七夕传说结合在一起了。

牛郎带上金牛留下的两支牛角、一张牛皮等，挑起孩子，上天去追织女。眼看就要赶上了，织女用金钗和银钗划出了金河和银河。牛郎用一部分金牛残骸把金河填平渡了过去，但最后一条银河却没有东西填了。牛郎怒火万丈，拾起牛索子就朝织女攢去。织女就用织布梭子回攢牛郎。织女星中的三颗星就是牛索子，牵牛星旁的四颗星就像梭子。玉皇大帝规定二人七月七日相会。那一天，金牛星请来喜鹊在银河上架桥。^①

这一类型以织女逃走为中心情节，说织女为逃避牛郎追踪用钗子画出了银河，牵牛和织女又隔着银河攢东西。这个传说表明现今夫妇吵架相互攢东西这一习惯就起源于牛郎织女那时的行为。

以上，举出了围绕牵牛和织女的四种类型民间传说。第二个类型即与梁山伯、祝英台传说合流的，尚不具备构成一个类型的数量与内容。余下的三个，其核心中各自保留有自古以来的要素，不可简单论断其层次新旧，但如把视野扩大，则第一类型保留着最古老的形貌，第三种类型是最发达的形态，第四种类型则应认为是已超越其发展顶点而有某些质变的产物。牵牛织女传说就其发展大方向说，可以理解作是随时代而强化了世俗化的倾向的。第三类型中嫂子虐待弟弟的主题，以及第四类型夫妇吵架的描写，正清楚地显示了这种世俗化倾向。

这样，起源于往古时代的牵牛、织女传说，在世俗化这一大的潮流中，汲取了种种要素，现在仍在人间传说着。下面，拟在广阔的时间范围内，推定构成这个传说本来核心的神话的要素，看一看它是如何在时代中发展并形成传说的。

二 乞巧奠

七夕这一天赋予人们生活以巨大的光彩，当然不只是因为存在着与它

^① 《民间文学》1985年第7期《织女变心》，又同刊《牛郎织女结冤仇》（河北束鹿一带流传）。赵景深在《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见《民间文艺丛谈》）一文最后，举出在天津和永嘉等地流传的织女拒绝牛郎的传说，认为是牛郎织女传说的“糟粕”，就属于这第四种类型。

相关联的牵牛与织女的传说。更重要的是,与这种传说结合为一体,在这一天要举行保留着某些宗教要素的礼仪和行事。牵牛与织女传说虽然经常作为故事而独自流传,本来却是专用以说明七夕行事的起源的。如从现存的七夕行事状况看,传说与行事几乎是各自独立而分别流行,两者间看来不一定有强固的相互关系,但这是在时代潮流之中演变的结果。越是追溯到过去,传说与行事的关系必定越加紧密。如果要追寻七夕风习本来的意义,那么把这现在流行中已稍有离异的二者相重合,设想出存在于二者背后的作为其共同起源的统一观念,必然是一个可行的手段。

关于七月七日夜举行的行事,《荆楚岁时记》的下面一段记事,属于最为古老的确切记录。其中这样说: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家人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钗石为针,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①

从《荆楚岁时记》的这段记录可以知道,早在六朝中期,关联到今天的七夕行事的主要部分已经形成。即是说在这一时期,七夕行事已经是七月七日夜在户外(庭院)举行的以女性为中心的祭祀。女人们献上酒与瓜果以乞“巧”。由穿针引线可知,这里所谓“巧”,主要是指女性缝纫和纺织的技巧。这里又注意到蜘蛛网,大概也与纺织有关。有一个稍嫌小说化的记载,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里有个杨贵妃的故事,说七月七日夜宫女们分别捕捉蜘蛛放到盒子里,第二天早晨看蜘蛛结网的形状,来占卜是否得“巧”。还有下面引用的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关于北宋都城开封七夕的记载,以及周密《武林旧事》中同是叙述南宋都城临安七夕的热闹场面的一条,等等,记录着同样地使用蜘蛛的风习。毫无疑问,蜘蛛牵丝为网,是象征着所织成的纺织品的。

顺便指出,大概是这七夕中使用过的七根针,现仍保存在我国正仓院遗物之中(图6)。这可能是原原本本承袭自唐代宫廷风习的。例如在《大唐

^① 宝颜堂秘笈本。又参见守屋都美雄译注、布目潮瀨等补订:《荆楚岁时记》,平凡社《东洋文库》,1978。